

揭幕民营经济中国式进程



中国往事 30年

THE MEMORIES OF
CHINA IN PAST
30 YEARS

中国往事 30年
THE MEMORIES OF CHINA IN PAST 30 YEARS

张志勇◎著

中国往事 30年 THE MEMORIES OF CHINA IN PAST 30 YEAR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往事 30 年：揭幕民营经济的中国式进程/张志勇著.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9. 10

ISBN 978 - 7 - 80257 - 075 - 7

I. 中... II. 张... III. 私营经济 - 经济史 - 中国 - 现代 IV. F1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7724 号

中国往事 30 年——揭幕民营经济的中国式进程

作 者	张志勇
责任编辑	盛 娟 谷婷婷
责任校对	韩会凡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 - 63567679 63567960 (编辑部) 63567683 (发行部)
网 址	www. edpbook. com
E - mail	jjrb58@ sina.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21. 75
字 数	33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7 - 075 - 7
定 价	38. 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言 经济史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史密切相关 / 1

前 言 民营经济到底是一种什么经济 / 7

第一章 春来草自青 1978 年的前前后后

1 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 / 24

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

2 为什么是温州 / 26

哪里受“左”的影响越深，哪里就越要寻求突破。

3 解放思想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28

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4 不仅仅只是小岗村 / 34

17 个指印，三方图章，一片血红。

5 “科学的春天” / 38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

6 36 天与 5 天——历史的转折 / 41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第二章 示范下的燎原之势 1979 ~ 1983

1 五老火锅宴 / 49

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 2 包产到户是对“私”的承认 / 55
“《人民日报》能给你饭吃?”
- 3 知青大返城“逼”出的“新生路” / 64
“我要告状”，“我们要见华主席，邓副主席”
- 4 一纸执照，个体户有了“身份证明” / 70
做小商小贩低人一等不说，关键是没有一个正经的身份
- 5 剥削、雇工，“鱼塘风波”与“太爷鸡” / 73
“不准雇工”。而剥削更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容的
- 6 “投机倒把”直逼温州“八大王” / 78
“投机倒把是个筐，什么罪都可往里装”
- 7 必要的、有益补充与个体经济入宪 / 85
为什么一谈市场经济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
- 8 雇工7个人还是雇工8个人 / 92
看一看，不要动他们
- 9 “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 / 95
“胡耀邦说我们是光彩的”

第三章 从隐蔽走向公开发展 1984 ~ 1988

- 1 知识分子下海 / 106
“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四自原则”
- 2 “倒爷经济”和“价格双轨制” / 112
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可以说是“价格双轨制”的直接收益者
- 3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两个模式”的出现 / 118
苏南这个地区的经济，现在看来已经可以成为一种模式了
- 4 理论突破，所有制结构中私营经济有了一席之地 / 126
43岁的任正非和5个朋友一起创业，合股组建华为公司，注册资本为2.1万元
- 5 私营经济入宪 / 132
1988年底才有了私营企业统计数字

第四章 在低回中缓行 1989 ~ 1991

- 1989年的关键词：“风波”、“傻子”、“红帽子” / 141

1990 年的关键词：治理整顿、证券交易所 / 145

1991 年的关键词：姓“社”姓“资” / 150

第五章 滚滚春潮势不可当 1992 ~ 1996

- 1 小平“南方视察”谈话 / 159
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
- 2 民营企业走向前台·市场经济入宪 / 167
提“大哥大”的政协委员
- 3 光彩事业·《福布斯》推出中国富豪榜 / 173
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
- 4 恢复本来面目·戴出麻烦的“红帽子”及万言书 / 186
“红帽子”：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
- 5 “桃子”不是那么好摘的 / 197
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

第六章 从“重要组成部分”到“建设者” 1997 ~ 2001

- 1 重要组成部分的提出 / 205
直面“万言书”，冲破所有制崇拜
- 2 国退民进 / 214
没有不准出生的人
- 3 1999 年修宪 / 218
这是所有制平等的又一进步
- 4 “双思”·私营企业主入党问题·资本的力量 / 227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
- 5 信用经济·“建设者” / 234
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第七章 一个更加充满挑战的时代到来 2002 ~ 2007

- 1 “两个毫不动摇” / 245
“我们现在不怕当有产者，还要争当有产者。”

2 中国富豪的“多事之秋” / 254

网上的一些消息和对民营企业家的谩骂，表明大众对民营企业家的理解是错误的

3 第四次修宪法·保护私产 / 267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4 “非公经济36条”颁布·资本的“魔咒” / 279

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

5 新社会阶层·“原罪”问题不再讨论 / 293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6 《物权法》·“两个平等” / 308

主要的问题还是私权利受到公权力不合法的侵犯

第八章 不平凡的2008 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

重要参考书目



经济史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的 日常生活史密切相关

—

我是三年自然灾害后出生的。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是天灾还是人祸，现在有不同的说法，但在共和国 60 年发展史中，1959 ~ 1961 年，这三年普遍还是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的一些细节常常使人“刻骨铭心”，其中有两个故事是我了解到的，一直深深地埋在我心里。

一个是我中学老师的父亲的故事，这位老师的父亲生活在农村，属于“五保户”的孤寡老人，1962 年的春节，生产队为了照顾这位捱过饥荒的老人，分给老人二斤白面，两棵白菜，半斤猪肉，想让老人过个能吃上饺子的年，可谁知，这位经过饥荒的老人，一次就把用二斤面做的饺子几乎全都吃了下去，大年初一，老人就死在炕上，身边的饭碗里还剩几个没吃下的饺子。当时只知道饥荒时饿死人，怎么也没想到刚能吃上饱饭时，还会撑死人。

另一个故事是我大学时一个学长的真实故事。1960 年，学长 11 岁，每天都吃不饱，经常到城外的荒地里去挖野菜，最后连野菜也找不到了。一天他看到一个孩子手里拿着一块烤地瓜，烤地瓜的香甜味和他饿得无法承受的胃口，迫使他抢过那个孩子手中的烤地瓜就跑，还没跑几步，就遭到几个大人的围堵，情急之下，他快速地把烤地瓜往嘴里塞，几个大人对他拳打脚踢，但他仍不停地把烤地瓜塞进嘴里。当晚，他的口腔里到处是被烤地瓜烫的水泡，几天后他的两颗门牙也掉了，后来才知是被烤地瓜烫掉的。

关于挨饿吃不饱饭的记忆，对我这个城里长大的孩子来说还不多，但生活物

资的极度匮乏，我记忆犹新。当时我生活的那个城市是每人每月供应三两豆油，食物主要以玉米面和高粱米为主，蔬菜得用菜本去买，买豆腐也得拿票并且要排队。1970年，我父亲从一个朋友那弄来一点花生米，母亲炒了后，给我和弟弟每人分了几十粒，我们都舍不得吃，一天吃几粒，几十粒的花生米，我吃了一周。1978年之后，家里第一次可以让我放开肚子吃煮鸡蛋，15岁的我一次竟吃了9个煮鸡蛋，母亲怕我吃得太多不消化，再三阻拦，我才没有去吃第10个。

整个社会的物资匮乏，加上那时得知的一点点外国人的生活状况，我始终在想，我们伟大的祖国和在这片热土上生活的华夏儿女怎么就这么穷呢。

1978年，我见到最大的票是面值10元的钱，我认识的钱只有人民币，有一分的，二分的，五分的，一角的，贰角的，五角的，一元的，贰元的，五元的和拾元的。1979年我已上高中，之后从高中和大学的课程中，我接触了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让我知道了什么呢？概括起来是四句话：第一，价值是劳动创造的；第二，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创造的；第三，企业利润和资本都是工人的剩余价值转化的；第四，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把资本家打倒。而无产者的定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工人。《共产党宣言》中有句十分响亮和鼓动人的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做什么？显然是要成为“有产者”，要摆脱贫困，要过好日子，要有资本。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的头脑里既没有“有产者”的概念，也不知资本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和羡慕“万元户”，而万元户对于我又是多么地不可及。

我后来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前面往往有三个定语，“勤劳、勇敢、智慧”或“勤劳、善良、勇敢”。中国人在华夏大地上耕耘了5000年，但到了1949年，毛泽东总结说“一穷二白”。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解释的问题，中国人是勤劳的不是懒惰的，是勇敢的不是懦弱的，是智慧的不是愚笨的。但为什么耕耘了5000年其结果竟落了个一穷二白？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辉煌的时期，也不是没有创造过财富，但为什么辉煌不能够保持，财富不能够延续？为什么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竟不能富有？决定国穷国富的“金钥匙”在哪儿呢？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制度不仅使中国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和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也十分恶劣。

1978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320公斤，而1956年仅为310公斤，1960年还下降到215公斤，很显然中国的粮食产量整整徘徊了22年。

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另有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有2/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20世纪50年代，有1/3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20世纪30年代。

而“文革”的十年动乱时期和1958年“大跃进”（我把1958年视为乱动时期），使中国的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

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勇于面对现实，并显示了巨大的政治诚意，从而迎来了新的发展。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30年的改革开放是对上一个30年的“救赎”。

20世纪80年代之后，摸着石头过河让我对未来有了想象，而理想的彼岸是什么，决定到达和实现理想彼岸的因素是什么？

政策？开放？改革？市场？体制？制度？法治？……我始终坚信有其内在的规律可循。1992年之后，我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上。这一时期，我正在完成时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艾丰指导的一个选题，在向他的请教中，使我对体制、产权、所有制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二

1993年之后，由于做记者的原因，我所接触和采访过的大大小的民营企业已不计其数，这使我既对民营经济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对民营经济发展、变化等多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一年正值四通集团成立10周年，这之后，民营企业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也都显现出来，而且也是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2000年，我的第一部研究民营企业生存状态的专著《挣扎与较量》出版

发行。我在该书中提出必须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民营经济的发展。

2003年，我撰写的《有产者启示录》出版发行。通过对钢铁大王李海仓被杀前后事件的采访，我提出善待“有产者”。在新书出版发行的座谈会上，来了很多知名学者和专家，有茅于軾、盛洪、钟朋荣、艾丰、姚景源、王卫国等，显然他们不是冲作者来的，因为他们事前几乎不知道作者是谁，他们是冲我所关注的民营经济领域中感兴趣的话题而来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先生是骑着自行车来的，老人家已七十多岁，让我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2005年初，国务院颁布“非公经济36条”。至此，在我看来，关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初的不该提倡，到看看也不取缔；从正面鼓励，到“补充”和合法地位；从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到快速稳定发展；从重要组成部分，到“建设者”和“两个毫不动摇”；以及2003年之后进入新时期、新阶段，到“非公经济36条”的颁布，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基本解决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所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政策层面上的问题也基本解决。由此而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主体地位也得到了确立。

在“非公经济36条”颁布之后，我重新梳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变化过程，觉得应该把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放在中国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的大背景下加以研究，从中找到并回答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和存在的内在动因，这将是具有价值的研究。

显然，这是一个重大课题。2005年年底，我、黄文夫、夏小林三人承担了国务院批准立项的课题《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我们三人承担的是研究总报告中的分报告，即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为了更加全面和理性地梳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把视角放到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现状背景下，我集中力量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建国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过程，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走向和实践过程。这都对我后来决定要写这本书，仿佛是提前做了必要的功课。

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和快速发展，可以说是30年改革开放的最大亮点。客观地说，对30年民营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并不少，但大都是院校和一些机构对30年来一些数据的整理和归纳。2007年年底，身为民营企业家的冯仑出

了本《野蛮生长》，很多人觉得，这本书和民营企业很近了，但书的内容大都是他个人的感悟，所涉及的民营经济也主要是 1990 年之后属于他个人化的东西。至今还很难找到一本可以让人通读的 30 年民营经济发展史。

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2008 年春，我开始了民营经济 30 年发展史的写作。首先，我不是经济学家，所以我的写作不是理论专著；其次，我个人没有经过商，但由于职业的关系，民营企业家的所思所想，他们的创业史和发家史，及他们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我了解和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作为记者出身的我，深知真实地记录是最大的价值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职业记者的天职所在，更何况我在民营经济这一领域投入了近 20 年的关注。

对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不能割裂，而很多研究民营经济的专著大都是就 30 年说 30 年，无形中把 30 年民营经济的发展史给孤立了。如把民营经济 30 年发展史放在共和国成立 60 年的大背景下来记录的话，将会让人更全面地理解 30 年民营经济的发展，并且会更加坚定民营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正是这个判断使我的写作有了使命感，并在写作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和快感。

经济史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史密切相关。30 年的民营经济发展史，它伴随着经历过 30 年改革开放的每一个人，对见证着共和国 60 年发展的人来说，很容易把前 30 年和后 30 年做比较；而对史学家来说，更容易把共和国 60 年和之前的 60 年加以研究。我在写作这本书时，是将自己视为一个普通的人，在 30 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去探寻民营经济 30 年的整个发展史。我讨厌生涩和故弄深沉，我喜欢我的文字表达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民营经济 30 年发展史，其实就是当代史，我渴望我的文字不仅仅做为史留下，更能让当代人读出历史的真实，真实的力量大于一切，准确的把握是价值的所在。

三

1978 ~ 2008 年，是共和国 60 年历史上全面转型的 30 年，是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共同想要实现的目标“重合”在一起的 30 年。中国人对财富、对市场的期需，以及资本的喷涌，使一种力量不断地被焕发出来，汇集成“民营经济”。至 2008 年，民营经济已占 GDP 的 65%。

数字是枯燥的，但由于做财经记者的原因，没有数字常常使我不说话，写出的东西使我感到单薄无力。数字多少会给一部分人在阅读上带来些不便，但数字会让你更直观，了解数字的变化，你会找到数字给你带来的另一种乐趣。

1978年，中国的人口是9.6亿，到2008年年底是13.2亿，增加了3.6亿。2006年10月17日，美国人口总数才突破3亿大关，也就是说，30年间，我国新生的人口，比美国全国人口都多。改革30年间，GDP平均以每年9.8%的速度增长，使中国从人均国民总收入199美元的贫困低收入国家，走到了2008年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的中等偏低收入国家。

下一个30年的中国会怎样？是否还会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的时候社会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计划经济时代，国民普遍都处于贫穷状态，而在由计划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贫富的差距在不断地显现，留下的问题将更加凸显。未来诸多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不得不去看我们所走过的路。

谁也无法预知未来，但如何把握现在，却决定着未来的方向，个人、企业、经济都是如此。

应该说，在民营企业对下一个30年发展存在困惑的时候，2007年年底，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9月中旬之后，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年轻的中国民营经济首当其冲，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遭遇从未遇到的经济变动。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如1997年经济下行的挑战，民营企业也曾遇到过，但都没有经历过经济危机的洗礼。客观地说，经过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的人，现在活着的也不多了，而我们的民营企业更是一个知之甚少的小学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官方的语言是促进民营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而现实是，民营企业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

30年前，危机导向的改革，逼出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资本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和喷发。如何利用这次危机，重新激发企业家精神，在体制性政策和制度层面上，更进一步地开放市场，使市场化改革有新的突破，这可能会给中国经济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而应对危机也预示着民营企业将全面进入一个调整期。

但我坚信，民营企业会率先突围。从这本民营经济30年发展史中，读者应该能找到答案。

前言

民营经济到底是一种什么经济

“不要再认为民营企业家是剥削者，要认识到他们是创造财富的人。一个社会的生产绝大多数是在企业内进行的，如果企业的状态正常，社会就有很强的生产力；如果企业搞得七零八落，这个社会生产力便不会得到保护。如果我们缺少企业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便会受到巨大的破坏。”这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先生在2003年8月出席由我撰写的《有产者启示录》一书的座谈会暨首发式上所讲的话。

参加那次新书出版座谈会的，除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外，还来了很多经济学家和民营企业家，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我把“有产者”这一概念鲜明地提了出来。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做什么呢？显然，是要让无产者自己最终成为有产者。^①应该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但同时，在共和国发展过程中（主要是指“文革”之前），为什么又在回避人对资产的“所有”呢？有产者，为什么要和资产阶级、私有划等号呢？从资本社会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30年的改革开放，民营企业作为资产的拥有者，给社会带来的财富和经济的发展，是全社会共享的。

而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和鼓励人们财产性收入，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重新对无产者到有产者的辩证思考，是对资本的重新认识。

据国家工商总局2009年年初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

^① “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喻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只要他对“资本先生”的价值增值的需要成为多余时，就被抛向街头。《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4页。

实有私营企业 657.42 万户（含分支机构），实有注册资本（金）11.74 万亿元，个体私营经济实有就业人数为 1.37 亿人。

从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口径来看，私营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是从经济的属性来确定的，而从全社会形成的普遍认知来看，又统称为民营经济。

30 年的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特有”的经济名词。

之所以说它“特有”，客观地说，这个经济名词只是对中国多种经济形态的一个综合描述，而且也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基本搞清楚，而这种清楚也是相对笼统的“清楚”。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外国人很难理解我们说的“民营经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经济。西方没有这样一个经济名词。

准确地说，民营经济不是一个含义十分明确的经济上的概念，可以视为中国人对 30 年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具有经营自主性的“非政府经济”给予的约定俗成的称谓。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出现很多新的名词，“民营经济”是众多新名词中的一个。准确地说，这个名词的广泛使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009 年还不到 20 年。

但“民营经济”一词至今在中国共产党正式的官方文件及公开表述中还没有被正式使用，总的来说，即没有理论上的权威定义，也没有明确的形态界定。只是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上，出现在各级政府的公文中，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言谈话语里。在大量的经济名词里，涉及“非政府经济”的有个体经济、非国有经济、私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私有经济、非公经济、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

关于“民营经济”这一概念，其实早在 1998 年就有过争论，争论的起因是当年国家工商总局曾要求“禁提民营”，由此而来引发了有关民营经济概念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很快就超出了官场范围，于光远、厉以宁等经济学家及一些学者和社会各界关注经济发展的人士参与在这场问题的讨论之中。于光远先生曾明确地表态：“我赞成使用民营经济这个词。”然而这个概念至今仍没有明确的论断，客观地说，现在都躲开不争了，又都这么用下来了。

这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如今在使用中已被泛化，并已成为全社会的习惯用

语，但在在我看来这其中回避了很多实质性的问题。如不把这个称谓问题说清楚，30年来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很多东西都很难说，想绕都绕不开。应该说它即是理论问题又不是理论问题。因此，我先要说说这个中国“特有”的经济名词。

“民营”溯源

关于“民营”一词的出处，可考证的历史记载有很多处，但目前人们普遍认同的主要有两处。

国内第一个提出“民营”概念，并使用这一词的是我国经济学家王春圃先生，他在1931年出版的《经济救国论》一书中最早使用了这一概念。书中把民间经营的企业称为“民营”，主要是与“官营”相对应。

中国共产党提“民营”的第一人是毛泽东，见毛泽东1942年12月《抗日战争时期的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一文，这是当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第一章。当时的原题是“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①。文中说：“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与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1941年和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封锁，解放区的财政发生了极大的困难。1941年，八路军的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搞大生产运动，解决生存问题，该旅旅长王震就此名扬天下。毛泽东提出党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并号召解放区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以克服财政和经济上的困难。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产生的。报告中，毛泽东对“民营”是有解释的，他说：“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

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胡乔木对当时的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做了详细的说明，他说：“边区的经济分为民营和公营两大类，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就是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农工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893页。

商业。”

翻阅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当时民营、民营经济的所指非常明确，就是私营、私营经济，而不是今天这样的泛指。这与我国台湾及国外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

在这里我有必要做些补充，其目的就是更好地认知“民营”的由来。

1894年之前，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一直是禁止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的，也就是说，不允许民间资本做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中国人深受其辱，很快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对我国国力的反思，并认为只有像日本那样发展民族私营企业才是强国的根本。与此同时，由于清政府与日本在1895年4月17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投资，于是也就不便继续禁止民间投资办厂了。

《马关条约》是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的关于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不平等条约，共十一款，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与“财富”有关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岸搭客装货，日本政府可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意设立工厂、输入机器，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在华制造的一切物品免征各项杂税，所有日货均可设栈寄存。次年，又据本约有关部门规定，订立《通商行船条约》，日本攫取在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该约是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它适应了列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要求。

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些辱国的条约下，清政府是无力禁止私人办企业了。再加上当时清政府财政极为困难，也无力“官办”新式企业。清政府内外交困，财力亏空，不得不改变过去禁止民间办新式企业的政策，颁布了“饬令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的电旨。1895年8月，光绪皇帝还颁布诏书，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开启了清末官办企业寻求私营、私有化的路径。由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有了较快的发展，也就是在这一阶段，中国出现了民间兴办新式工业企业的小浪潮。

关于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已故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做过专题研